

HUIZHOU JINDAI SHIFAN JIAOYUSHI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

(1905—1949)

方光禄 许向峰 章慧敏 等◎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HUIZHOU JINDAI SHIFAN JIAOYUSHI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

(1905—1949)

方光禄 许向峰 章慧敏 等◎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沈 非 祝凤霞 王一澜

责任校对:潘 安

装帧设计:丁奕奕 朱 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1905~1949 / 方光禄等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676-0801-6

I. ①徽… II. ①方… III. ①师范教育—教育史—徽州地区—近代—1905~1949

IV. ①G65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2308号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1905—1949)

方光禄 许向峰 章慧敏 等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00×1000 1/16

印 张:20.25

字 数:377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801-6

定 价:42.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王振忠

婺源“末代秀才”詹鸣铎，在其撰写的章回体自传《我之小史》中，有不少章节对晚清科举制度废除前后徽州的民风土习做了生动的描绘。例如，清末废除科举之后，为了满足大批旧学生员对功名的渴求，官方仍然举办优贡和拔贡的考试。这些人经朝考合格，可以择优分等授予官职或教职。宣统元年（1909），詹氏在省会安庆府投考拔贡交卷后，看到一位来自本省宿松县的老人，竟与儿孙三代同考，詹鸣铎认为鹤发苍颜仍来考贡，应是“名心不死”的缘故。接着，他又触类旁及，提到此前婺源县一位姓施的老生宿儒，此人虽已年逾花甲，但却仍然一再参加童子试。此后，科举制度彻底废除，大批读书人涌向新式学堂。结果，这位龙钟老叟亦随大流进入师范传习所，与年轻人一起时髦地习练起武术和体操，“别人跳，他也跳，以致跌坏了脚……”

詹鸣铎讲述的例子，反映了晚清教育与社会剧烈变动形势下读书人的心态举止，折射出民间社会对于新兴的师范教育之基本反应。事实上，当时的人们视师范教育为“科举时代之变相”，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科举制度下显亲扬名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对此，耿夫在《歙县教育的面面观》中亦有类似的描摹：

歙县教育发达极了！居然有位七十多岁的老头子，带了自己的孙子，到国语讲习会里，去听了三个礼拜莫名其妙的ㄅ ㄆ ㄇ ㄉ ㄋ^①，回到家来，门上贴起黄纸的报单，上面写着“国语讲习”、“祖孙及第”，还有“高小毕业”、“叔侄甲等”、“小学卒业”、“升学录用”、“检定教育”、“教育部令”、“单级讲习”、“兄弟连科”等字样，不计其数。……又有一位教员先生，歙山里人无知识，居然私卖毕业文凭，得文凭的人，也就贴起报单来，开贺祭祖。从此以后，眼见得他又又要做一个山皇帝了。

一般人的头脑太新了，还要把他移到光绪二十年去！一旦毕了业，第一着就是印报单文卷，第二着就是拜客，第三着就是开贺请酒。这也算是

^① 民国时期按罗马字拼音法式拼写的几个声母符号，即今天汉语拼音中的“b、p、m、f、k”。

威风到顶,所谓踏到“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美境了。那知今年有一位师范毕业生方某,以为像这个样子,还不算出风头,居然请了两个戏班,做对台戏,我想前清状元公,恐怕还没有这等风头哩!最奇怪的,还有城里一班大老先生,乘了轿子,洋洋得意的去道喜看戏。大约还叫唱戏的跳了两个加官吧!哈哈!

在传统徽剧的开场中有“利市三跳”之名目,内容是跳魁星、跳财神和跳加官,具体做法是演员扮演八仙、金童玉女、王母娘娘、魁星、财神和加官等角色,由锣鼓、唢呐等鼓乐伴奏,祝福当事人应举夺魁、招财进宝和加官进爵。跳加官时,演员头戴面具,身穿红蟒,腰系科带,脚着高靴,右手捧着朝笏,在锣鼓声中粉墨登场。及至戏台中央,便先后亮出加官条,众八仙等高声叫好助兴。此时,扮演“加官”的演员口中念念有词,说着“一品当朝”、“天官赐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类的利市话……

耿夫的这篇文章作于1925年,刊载于当年颇为重要的一份同乡刊物——《微音》上。其中,也提及徽州的师范教育。从中可见,尽管当时进入民国已有十余年了,但徽州人自师范学校毕业,黄卷青灯,壮志鹏飞,与明清时代科举及第的社会反响如出一辙。从迄今尚存的《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讲习科毕业试卷》来看,其间不但列有一长串先祖、业师之名讳,而且还特别强调“本校毕业考试及第”,其格式与科举时代之朱卷并无二致。唯一稍有变化的,只是承印此类文卷的书坊,已由著名的“徽城乙照斋”改为时尚的“徽城维新斋”而已。

徽州的师范教育,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许承尧创办的新安中学堂附设之师范科。翌年,附设的师范科单设为徽州府紫阳师范学堂,其学堂经费来自著名的紫阳书院之常款。光绪三十二年(1906),歙县岔口举人张云锦等人,依靠茶捐及私人捐助创办了双溪师范,该校存续时间未久,即改为大洲公学。对于清末师范教育的早期历史,历史学者方光禄认为:徽州近代师范教育的诞生,“既是地方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与欧美近代文化的强势渗透相作用的结果,又是区域社会精英主动适应与国家行政力量强制推行相结合的产物”。

晚清时期,源自西方的师范教育制度传入日本,继而又由东瀛传入中国。早在光绪年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即在《万国公报》上发表《师范说》一文,其中提及:“自强之道,必以作育人材为本,而作育之事,则以设立书院为先,尊其名曰书院,核其实即学堂也。特是创院虽易,求师甚难,欲得一品学兼优者,俾诸生有所效法,已属难能而可贵,尤必循循善诱,引掖有方,庶能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养其才以待用,不亦难之难乎!”在他看来,所谓师范,即“师之模范”。此

种师范教育,与中国本土悠久的尊师重教之传统相互融合,遂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师范教育制度。在传统时代,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这一观念也促成了清末、民国初期民间社会对师范毕业生的期许与敬重。

晚清以来,徽州师范之创立、嬗变,与救亡图存的启蒙思潮密切相关。在这一背景下,二十世纪历史上不少著名的人物,都与徽州师范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譬如,许承尧是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钦定翰林院庶吉士。他于翌年返归歙县,先后创办了新安中学堂及紫阳师范学堂,并亲任监督,开启了徽州“新教育”的先河。许承尧是清末著名的诗人,杰出的徽州乡土史家,其人不仅胸藏万卷笔扫千军,而且还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与同盟会志士陈去病、汪律本及黄宾虹等人一起组织“黄社”,以研究学问为名,开展反清活动。在他的交游圈中,陈去病为江苏吴江同里人,也是著名诗人,南社的创始人之一。而黄宾虹则是歙县潭渡人,为中国现代最为著名的画家之一。陈去病、黄宾虹等人都曾受聘在新安中学堂任教,为徽州早期的师范教育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又如,著名的教育家胡晋接,曾以《中华民国分省地图集》蜚声国内,其人熟读诸子百家,尤精于程朱理学,1913年奉命创办安徽省第五师范学校(次年改称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校长长达十五年之久。其间,他倡导自力更生,勤俭办学,造就了众多的人才,为徽州教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再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也与徽州的师范教育密切相关。陶氏是歙县黄潭源人,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新教育》主编等,倡议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行平民教育。他认为:“徽州的教育问题,关系新安二十万子弟之前途。”1922年,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学校创办,陶行知出力颇多。他将该校作为推行平民教育的实验场,在他的直接帮助下,第四女师创办之初,即附设平民学校,在休宁隆阜周遭对村民推行识字教育。针对当时徽州师范教育中的佞佛风气,陶行知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佛学是值得研究的,但是只可让那田园充实、娱乐晚景的福人去皈依佛门,日诵菩提,断非可语于终日为生活而忙碌的劳工,和志在改良社会、为国捐躯的青年。可以闭起家门诵佛礼忏,断不可在公家办的师范学校里一面领薪俸,一面宣传佛法。”此外,还有相当不少,如绩溪人胡适,婺源人江峰青、江谦,黟县人胡元吉,江苏川沙人黄炎培等,这些在徽州本土和外埠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过徽州的师范教育。

民国以还,安徽省将全省师范学校划分为六个学区,徽州一带原来隶属于第五区,遂设有安徽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后迁休宁万安新棠村,改名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这是在皖南最具影响的中等师范学校。该校的办学,崇尚“信实”、“勤俭”、“谦逊”、“亲爱”、“公德”、“常识”、“遵法”和“尚武”八个方面,在师范教育中提出过不少重要的理念。1922年,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学

校建址于休宁隆阜,该校提倡“德、智、美”,认为女子亦“要负改良旧社会的责任”。对此,一位叫许悦音的女士,曾写过《敬告徽属女师范生》的文章:

教育不是抬高人家身价的,不是做人家择配的广告的,受了教育,要使自己做一个完人,受了师范教育,要养成一个好的师资,同时还要负着改良旧社会的责任(就是小范围内的),乡里的教育如何,女子教育又如何,你们是要负改良之责的,乡里的婚姻制度如何,你们是要负改良之责的。“女子为国民之母”,这一句极普通的话,想诸君总该知道的,所以我不希望你们做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我只希望你们明白你们自己是家庭中之一员,是社会中之一份子,负着重大的责任,自己做人,教人做人……,那么,才不愧做一个女师范生。

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还认为,乡村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应使儿童由爱家爱乡观念养成爱国爱种的热忱。1917年4月,教育部通咨《各学校假期修学办法》,要求师范学校组织师生开展调查、采集、旅行、温习课业、讲演教育等活动。为此,二师提出了“旅行修学”的理念,“每年春秋佳日,因时因物,指导学生实地考察,明确其观念,锻炼其身心,并养成随时随地自动的研究学问之能力”,也就是在旅行中对乡土社会做历史、地理、博物等诸多侧面的细致考察。当时展开的调查,明确指出“乡土”系指“住址所在之城镇或村落”,并开列细目:如乡土历史,有族姓由来及变迁、模范人物、名人著作等;乡土地理,则包括山脉河流走向、地势、气候、土壤、地质、名胜山水、道路及水利工程、田地山的收成、菜圃与果园、交通、邮政、旅馆等内容。此外,还有乡土物产、乡土社会状况、乡土民生状况、乡土教育状况等方面的调查。在徽州师范教育的相关刊物上,至今还保留有当年学生撰写的十数篇调查报告,颇具学术价值。对此,专门考察过徽州师范的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指出:“余观是校,不觉为之神往。夫所谓输入国民必须之思想学艺,而不破坏其淳朴懿粹之美德,卑异日有文明之启导,无习惯之扞格,与夫注意调查研究乡土历史、地理、农工、矿物,联络各地方小学,此岂仅新安师范学校家然也哉?而非易数觐矣!”(《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第二期“附录”)

此种乡土调查的风气,曾影响了整整一代的青年学子。例如,歙县岔口是除县城之外最早设立师范学校的徽州村镇。从当地走出来的吴景超,是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闻一多、罗隆基后来一同被誉为“清华三才子”。其人早年曾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他指出:岔口一带“自清初即崇礼教,重经学,雍、乾以降,有解元、举人数人,岁贡、廪生、生员十

余人,武秀才亦有数人。科举废,学校兴,又设有师范传习所、国民学校,毕业其中者,多设馆教授,称良师”。岔口村位于新安江上游,大源河与小源河在此汇聚,呈“Y”形,岔口因此得名。晚清以来,岔口是歙县境内茶号最多的地方。此处之所以成为兴办师范的最早场所,显然也与茶叶贸易的兴盛密切相关。而从岔口走向世界的吴景超,于1919年即曾撰有《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首位置,次沿革,次物产,次宗法,次生活,次教育,次风俗,次胜景”,此文显然也是当时乡土调查风气影响下的产物,迄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揆诸实际,清末民国时期新潮激荡,异说争鸣,徽州的师范教育虽曾乞灵于先圣前贤,认为“教育以造成善人为职志”,“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也”,“求善之教育,道学为体,科学为用”,这些理念在众声喧哗的时代潮流中难免不无拘执腐见之嫌,亦曾惹启悠悠众口,招致时人的诸多批评,但外观大势内审国情,胡晋接等人苦心擘划对“道德实践”之提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欧风美雨冲刷下国人对于东方文化的固守与追求,这一点难以抹杀。鉴于此,我以为,徽州的师范教育颇具特色,在中国教育史上理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值得学界同仁深入探讨。

在我看来,教育史涉及个人、社会、国家和文化,它不应是各类学校有关政治事件流水账的大杂烩,也不应是目前市面上常见的那类向校庆“献礼”的仓猝之作颂祝谀词;教育史亦绝非教育学的“内史”,而应当属于专门史的研究范畴;好的教育史成果应当在充分发掘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将教育史放在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中去考察,在人性的观照下,将精英教育和平民教育置诸区域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去阐释。以此为标准,迄今所见的不少教育史著作显然难以令人满意。这主要是因为一些作者缺乏历史学的基本训练,未能广泛收集第一手的档案文献,再加上常以中国大历史的分期作为小区域教育史之分析研究框架……,如此这般的教育史书写,明显过于粗疏,难以揭示教育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特色。不过,令人欣喜的是,这一现状近年来已颇有改观,特别是一些学有专精的历史学者,将教育史作为自己的专门研究领域(如明清徽州教育史研究、近代教会学校教育史研究等),迄今已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

光禄兄出生于黄山白岳之间,任职于徽州师范,他桑梓情深,早在1992年就曾编写过徽州的乡土教材。此后,随着海内外“徽学”研究的蓬勃开展,光禄兄立足于徽州乡土,采掇事实,殚心著述,发表过一些具有独立学术见解的论文。近年来,他又广泛收集资料,针对徽州师范教育史上的重要问题发表过数篇文章。此次他与许向峰等人合作,编写了《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1905—1949)》一书。对此,笔者拜读之余,颇多感触。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1905—1949)》一书的作者,采摭旧闻,探源竟委,

对1949年以前徽州师范教育的历史脉络,做了颇为细致的勾勒。该书不尚泛论空谈,严格依据档案史料说话。在史料的取材方面,既有收藏于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徽州师范学校档案室等公藏机构的相关档案,又有光禄兄个人从皖南各处辛苦收集到的民间文献。这些第一手的资料,很好地奠定了该书的史学研究价值。

对于该书的学术价值,以下仅据笔者个人的读书所见,稍做一点补充论述。前文述及,在二十世纪,二师是徽州的最高学府,培养过不少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它为皖南基础教育之维持与发展,提供了相当的师资保障。在徽州当地,不少青青子衿都与二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方面,《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1905—1949)》一书,保存了不少重要的资料,亦提供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线索,有助于我们对民间历史文献的深入解读。譬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笔者曾收集到一册日记抄本,封面题作“民国六年十二月省斋查辅绅”,右上角另有“毋忘国耻,注意自治”的字样。今查《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1905—1949)》,查辅绅为二师第一届毕业生,系婺源北乡的山坑人。抄本内容约一万余言,是查辅绅1918年“本科第四年级上学期寒假中之日记”。当时,二师主张学生自治,认为此事体大,“欲造成公民,必自兹始”,这一主张,也就体现在日记的封面上。从查辅绅的日记中,我们得以了解这位二师学生的所思所想。从中可见,心思旷远的查辅绅,经常阅读《通书》、《养真集》、《太极图说》和《华严原人论合解》等,他认为:“道家重命功,释门崇性功,各执一端,纷纷聚讼,考其由,皆于太极之理未深明也。”二月二十四日(旧历一月十四日),查辅绅曾作《中西格致之学之异同》,指出:“中国格致之学,兼道与艺,专以义理为重;西人格致之学,重艺兼道,故以物理为多,此则今日西人物质文明之所以一日千里也。而我国今日之一贫如洗,亦由趋重义理,至于极端耳。”这些文字虽稍显稚嫩,但也反映了他在读书之余对传统中国哲学思想及东西文化比较的思考与认识。徽州素以“程朱阙里”自居,当时,二师周围聚集了一些孜孜传授心法的耆儒硕学。例如,与胡晋接过从甚密、晚年曾讲学于二师的黟县人胡元吉,学宗程朱理学,著书立说,阐扬经义。他曾专门为师范科编有《初级修身教科书》,其内容以“简明显要,而切于身心日用为主”。通过此类教科书以及教师的言传身教,当时的不少师范学生均深受影响。二月十二日(旧历一月初二日),查辅绅曾写道:

……上午光阴于已告尽,回思年垂弱冠,马齿徒增,德业未进,正宜猛着祖鞭,临深履薄,毋枉来日为人师表。父亲评余平日行为“粗心浮气”,此四字诚余之药石箴言。然余一生以至诚为终身修德之目的,欺人自欺之学,余

不屑为。至于鲜衣华食,贪淫务博,尤非余意中所喜。男儿生世间,惟冀有以自效,使愚夫愚妇无不被己泽,方不负出阳间一番。兢兢业业,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余力向至诚,犹不免粗心浮气,不可不力自反也。古来英雄豪杰,无不自磨折出,经一番磨折,必多一番振作,所谓好事多磨。今晨同父亲言,正好鼓奋精神,前进勿复,切切以见贤思齐为念可也!

查辅绅的日记笔触细腻,文字凝练。在他的言志咏怀中,在在可见先儒懿言道德要旨,字里行间充溢着对流光空逝、年华虚度的忧虑,亦时常流露出睥睨乾坤、浮云富贵的自我期许。从其间的纷涌思潮中,我们仿佛看到这位二师学生磊落不羁、反躬自省的模样……

数年前,笔者在屯溪老街觅获一刊本之复印件,该书题作《汉镜斋堪輿小识》,全书约70页,这是民国时期皖南颇为有名的一册风水著作。该书的作者查国珍(字玉髯,号汉镜斋主人),从封三的自述来看,该书应是他五十岁之前所作。书中附录有婺源《星江报》所载的《数理家查玉髯刊行〈堪輿小识〉》一则:“九区凤山查玉髯先生,结业于安徽优师,湛深数理,执教皖省,南北造就颇众。近年来,于教课之余,涉猎堪輿书籍,于玄空理气推究极深。其学以中国古代河洛理数为本,证明堪輿为吾国一种玄妙哲学,其吉凶应验之理,比之今日之无线电,而玄妙更进若干层。著有《堪輿小识》一书,刊行问世,以科学脑筋谈古代哲学,为吾国粹放一异彩。其友洪瘦樵见而善之,称为蒋云间、刘青田而后一人,是亦我邑著作界之特色也。”“九区凤山”即婺源东北乡的风山,而“安徽优师”应当是指设在省会安庆的安徽优级师范学堂。作者受过现代教育的洗礼,后曾任教于二师,标榜以“科学脑筋谈古代哲学”,颇为与时俱进。书中内容炫异矜奇,不仅有对传统坟墓的堪輿,而且还有相当时式的“公墓设计”。查国珍后来曾任婺源县教育局长,但即使是在公职任内,他也“到处宣传,不时下乡应聘,替各地富户,迁葬祖坟”(《安徽教育行政周刊》第三卷第三十七期)。这些,也从一些侧面反映出师范教育对一些毕业生的影响。事实上,当年二师的主事者就认为:东方文明端在精神,西方文明乃在物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物质文明被判死刑的时代,有鉴于此,提倡佛学,讲求精神文明,于人类“功德无量”。为了修身养性,就必须让学生“尽性学佛,尽伦学孔,道学为体,科学为用”。而从两位查姓毕业生和教师的情况来看,不难看出师范教育的时代烙印和区域特色。上述的两个例子说明,不了解清末民国徽州的师范教育史,或许我们便难以对晚近的民间历史文献做出准确的解读。

由于师范教育与二十世纪徽州的社会变迁、文化发展关系极为密切,有关徽州师范教育的问题还有一定的开拓空间。仅以资料的发掘为例,就仍有不

少可以进一步着力之处。例如,在徽州,一些师范教育方面的专刊以及相关的民间抄本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而近现代报刊资料(特别是徽州同乡组织的刊物)上,也有不少有关徽州师范教育的精彩论述,倘能广泛收集定有更多的斩获。此外,为广拓见闻,口述调查似乎亦是亟待展开的一项工作。当然,也正因为如此,更加凸显了该书选题的重要性以及学术纵深感。

综上所述,《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1905—1949)》一书,为清末民国徽州教育史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后人可以在此基础上,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覃思细绎,继续探讨二十世纪徽州的教育与社会变迁。我也希望光禄兄能再接再厉,在前期的学术基础上为“徽学”研究再创佳绩。

对此,我充满期待……

今值该书付梓前夕,匆促写下上述这段文字,权作此书的序文吧。

2013年盛夏于复旦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萌生的历史基础与现实需要	1
第一节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萌生的历史基础	1
第二节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萌生的现实需要	3
第二章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的兴起——紫阳师范学堂的创立	14
第一节 办学设施与经费	14
第二节 师资的选聘	18
第三节 学生的招考	21
第四节 学制与课程	24
第五节 师生的反清活动	27
第六节 毕业生的教育实践	33
第七节 民国初年各县的师范传习所	37
第三章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的高峰——省立二师(上)	40
第一节 从省立五师到省立二师	41
第二节 办学经费与设施	50
第三节 学校管理部门及师资	63
第四节 省立二师的招生	71
第五节 严格的训育制度与实践	76
第六节 学制、课程与教材选择	93
第四章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的高峰——省立二师(下)	108
第一节 丰富的教学活动	108
第二节 省立二师的教育实习	127
第三节 附小的设立与运作	131
第四节 省立二师的毕业生	143

第五节 省立二师与全徽教育	156
第六节 胡晋接的教育理念	164
第五章 徽州女子师范教育的出现	172
第一节 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	172
第二节 省立四女师的沿革	174
第三节 省立四女师的办学实践	177
第六章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省立徽州师范学校(上)	185
第一节 省立徽师的创办与迁校	185
第二节 学校的基本管理机构	190
第三节 难以稳定的师资队伍	196
第四节 日趋微薄的教师待遇	203
第五节 因陋就简的办学硬件	208
第六节 省立徽师的招生	212
第七章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省立徽州师范学校(下)	231
第一节 省立徽师的学籍管理	231
第二节 师范生的待遇	243
第三节 省立徽师的课程设置	246
第四节 省立徽师附小的创设与师范生的实习	252
第五节 紧贴时代的学生活动	256
第八章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徽州各县的简易师范	267
第一节 各校沿革	268
第二节 教工队伍与管理	270
第三节 课程、设施与经费	273
第四节 招生与就业	279
第九章 徽州女子师范的余韵——省立歙县女子师范	281
主要参考文献	286
附 录	289
后 记	310

第一章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萌生的历史基础与现实需要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是在国家力量引导和支持之下逐渐建立起来的。它的萌生既是地方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与欧美近代文化强势渗透相作用的结果,又是区域社会精英主动适应与国家行政力量强制推行相结合的产物。它反映了历史基础与现实需要在这一特定区域和时期引发的教育制度的突变。

第一节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萌生的历史基础

素有“东南邹鲁”之誉的徽州,宋元以降,一直是我国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首先,学校类型众多,数量庞大。除了政府办的府学、县学外,书院林立。据李琳琦先生统计,宋代徽州建有书院(含精舍、书堂等)18所,约占全国总数(约400所)的4.5%;元代建有24所,约占全国新建书院总数(约282所)的8.5%^①;明清时期共存在过的书院更多达93所^②。此外,具有基础性、民间性的社学、塾学、义学遍布城乡,书屋、文会也所在多有。据康熙《徽州府志》记载,明代徽州六县有社学562所^③。因此,“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民居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④,形成了“十家之村,不废诵读”^⑤和“户诵家弦”^⑥的繁荣景象。

其次,徽州教育的目的具有明显的多元性。在传统社会,虽然普遍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生活的事实告诉人们,“读书—获得功名—成为公卿”毕竟只是极少数人生的人生轨迹,大多数人不得不从事一般的劳动以求生存。“凡我子孙,能读书作文而取青紫者,固贤矣。苟有不能者,毋诘置之不肖,尤当从容化诲,择师取友,以俟其成,庶子弟有所赖而不至于暴弃。虽不能为

① 李琳琦:《徽州教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② 李琳琦:《徽州教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③ 徽州地区地方志编委会:《徽州地区简志》,黄山书社,1989年,第257页。

④ (元)赵汭:《东山存稿》卷4《商山书院学田记》。

⑤ 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4《风俗》。

⑥ 康熙《祁门县志》卷1《风俗》。

显公卿,亦不失为才子弟也。”^①徽州不少宗族的如此教诲,以及“三代不读书,好比一窝猪”的民谚,促使徽州人即便从医、经商、学手艺甚至务农,也多曾接受过程度不等的正规教育,从而提高了徽州民众的整体素养。

最后,徽州教育培养出大批的社会精英。作为发达教育的最直接的受益群体,就是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者。据学者统计,明、清两代徽州文进士分别为452人、684人,各占明、清全国文进士总数的1.82%和2.55%,位居全国各府前列^②。在其他领域,也涌现出大批出类拔萃的徽州人,如医学界的汪机、汪昂,商业界的江春、鲍志道、胡雪岩,文艺界的张潮、渐江等,在全国都极具影响力。

徽州传统教育的发展与繁荣,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与徽州崇儒重教的文化传统有关。从汉代起,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唐末和两宋之交,不少显宦门第或儒学世家,从北方不断辗转迁入徽州定居,他们继承了崇儒尚教的优良传统,特别重视文化教育,走读书进仕、科甲起家之路。他们的成功,起到了深远的示范作用,逐渐带动了整个徽州教育、文化的兴盛。正如南宋淳熙年间著名地方志学者罗愿在《新安志·风俗》中所言:唐代以前,徽州“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故“武劲之风”较盛;唐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南宋以后,随着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哲学,朱熹的思想在徽州的影响扩大,这种崇儒重教的传统也在不断加强。

第二,徽商为徽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基础。“贾而好儒”的徽商,对家乡子弟的教育和培养可谓情有独钟,他们凭借财力的优势,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地资助教育事业。徽州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创立与维持,无不和徽商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说,在徽州,是教育造就了一支“儒商”;而这支儒商在鼎盛之后,又以其巨额利润反哺教育、发展教育,进而造就了璀璨的徽州文化。

第三,宗族为徽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徽州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宗族制度最为强大巩固的地区之一。这些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渊源的徽州宗族深知,宗族的巩固、发展、壮大,仅靠财力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发展教育,以确立宗族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地位。所以,徽州的强宗巨族对教育都有强烈的追求,不仅将其作为宗族教化和规范的内容之一,还主持创办、组织管理多种传统教育机构。

第四,大批名儒硕士热衷于教育事业,为徽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质量上的

^① 歙县《仙源吴氏家谱·家规》。

^② 李琳琦:《徽州教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

保证。如宋元时期的程大昌、吴徽、程逢午、胡一桂、胡炳文、陈定宇、倪士毅、郑玉,明清时期的朱升、吴曰慎、施璜、戴震、程瑶田、凌廷堪等,他们除著书立说外,不是讲学书院,就是潜心训蒙事业,许多人甚至终生从教。在教材和讲义的编写、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内容的选择等方面,他们积极探索、不断创新,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从而保证了徽州教育具有较高的质量^①。

经过数百年的不断调适,徽州人终于将经济、宗法、教育、文化等不同元素有机地整合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稳定和谐、有机结合的较为完美的社会整体。这样的传统一旦定型,即便社会遭受到外力的强势干涉,其潜在的活力依然不容忽视。

第二节 徽州近代师范教育萌生的现实需要

19世纪下半叶,欧美的坚船利炮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稍有眼光的中国官僚羡慕不已,由此揭开了轰轰烈烈的学习西洋技艺的洋务运动大幕。然而,甲午海战的惨烈失败和八国联军入侵的隆隆炮声,宣告三十余年投入的巨大财力、物力和精力付诸东流。中外差距日益拉大,根源何在?爱国志士痛定思痛,苦苦思索。在众多留洋学子尤其是留日学子对中外社会充分比较后,大家如梦方醒:社会制度的落后是造成国家衰弱的主要根源;重建新的社会制度最需要的是有全新理念的一代新人;造就新人,只能通过教育实现。因此,学习西方、创立新式教育制度就成为时代和社会的急迫需求。

肇始于隋朝的科举制度,逐步规范和左右着历朝学校制度的发展。尤其是在南宋以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元朝时,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和唯一标准。明朝以后,八股文的刻板程式进一步束缚了学生的思想。到了近代,科举制度从形式到内容,无不散发出一股陈腐的气息,有识之士对其发出的抨击之辞逐渐汇聚成一股汹涌激荡的浪潮,身居朝位且稍有见识的官员也不断上奏,向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皇帝建言,希望先从考试的内容,再到考试的方式,逐步改革早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人才选拔制度。

较早提出改革科举制度的主张可以追溯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这一年两广总督请开制器通算一科,同治元年(1861)贡生黎庶昌请开绝学之科,均被礼部驳斥,皇帝也认可礼部的意见^②。同治九年(1870),闽浙总督英桂、船政

① 李琳琦、储常连:《简论徽州传统教育发达的原因》,《光明日报》,2009-03-03。

②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28页。

大臣沈葆楨再次上奏,认为“水师之强弱,以炮船为宗;炮船之巧拙,以算学为本”。“朝廷于闽沪造船,津门造炮,可谓备矣”,但工匠依图仿造,“纵尽得其所当,然亦步亦趋,势且不及”。京师设同文馆、闽沪两厂均设学堂,“以讲明算法,可谓求其本矣”。“然精通算学者,必不肯轻去其乡以远涉重洋;杂出商贾间者,所指授皆肤浅之谈,未必有精心妙理。”因此,建议“特开算学一科”。军机大臣奉旨交礼部议奏。而礼部直至光绪元年(1875)才复奏,认为若开此科,“将不独应试者人数不敷,即主考者亦恐骤难其选。至若定以程式,又必开剽窃等弊而无济于用”。因此,按照已有成法,“多设其途,较之特开一科尤觉鼓励奋兴,不至以实求而以名应,庶算学不难日益精密矣”^①。其后的光绪十年(1884),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又奏请仿照翻译之例,在乡、会试中“另开一艺学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与考”,并提出分途取进、分地录取、择人襄校、酌定试期、酌定阶级、酌定事宜、广其仕进、核其课程、查访认真、宽严并用、广示招徕、破格收取等十二条具体措施^②,可惜朝廷亦无下文。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梁启超等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光绪二十四年(1898),严修奏请设经济专科;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终于,倾心变法的光绪皇帝在光绪二十四年(1899)五月初五发布上谕:“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旋将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首场按中额十倍录取,二场三倍录取,取者始准考次场,每场发榜一次,三场中毕,如额取中^③。与此同时,京师大学堂得旨兴办,各省府州县现有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

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京师大学堂硕果仅存,但科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的趋势无人能挡。其后的新政中,新式学堂依然在各省开办。鉴于科举之存在,“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致使绅富不愿筹捐,学堂经费紧张,又让入学堂者“不肯专心向学”、“不肯恪守学规”。于是,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底联合上了《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提出了具体的递减方案:

乡会试中额,请自下届丙午科起,每科分减中额三分之一,俟末一科中额减尽以后,即停止乡会试。

①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27页。

②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30页。

③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44—45页。